

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与使命的 表现形式及其深刻原因^{〔*〕}

施雪华

(北京师范大学 文科学报编辑部, 北京 100875)

〔摘要〕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与使命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是什么? 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界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大会上说: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为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总体初心与使命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 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通过探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总体初心与使命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深刻原因可以看出,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初心与使命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 民族国家建设、民主共和建构、人民中心确立、主权独立实现、中国道路探索。弄清了上述问题, 有利于我们更加坚定“四个自信”, 并用这些初心与使命去衡量我们的理念、法律、制度、政策和行为, 对照我们的国家建设、社会建设、思想建设和党的建设, 哪些方面做得不错, 哪些方面还需努力。这对于我们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初心; 使命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1. 12. 00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说: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这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总体性初心和使命, 为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具体初心与

使命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

任何个人或组织的目的和想法都是他们自身的特质在某个特定环境中对历史任务和现实职责的一种独特反应形成的使命感的结果, 由此可见, 历史环境、现实条件、自身特质这三大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客观外在的历史任务、现实职责是否能转化为主观内在的特定使命感, 而特定使命感又引导着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产生做或不

作者简介: 施雪华, 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审, 研究方向: 国家战略和政策、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道路与国外发展模式比较研究”(14@ZH007)阶段性成果。

做某件事或某些事的目的与想法。20世纪初的中国独特的历史环境、现实条件是如何诞生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这个无产阶级政党为何又具有与其他组织截然不同的使命感呢?

中国的政党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最早的政党组织是1895年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地方性革命组织联合建立“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政党。^[2]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宋教仁在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国民党,1913年被袁世凯解散。1914年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它是一个以反对军阀割据、统一中国、复兴中华为历史使命的政党。在中国已经有了中国国民党等强大的革命党的情况下,中国为何还要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与当时已经存在和后来建立的各大党派的组织性质又有什么区别?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是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灾难深重中的中华民族而进行的一场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为了领导这场革命而建立的一个崭新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初心就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没有自己特殊的政党利益和阶级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其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就是在一个以农业为主、工业薄弱的落后国家,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一场社会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是农民和工人等劳动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工农革命的领导力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是中国的一些社会精英在苏俄革命的鼓舞下,为了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一场社会革命理想的国别实验,中国共产党是这场社会革命实验的发起人和领导者等等。这些说法似乎都说

出了中国共产党开展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也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某些目标和任务,但都没有真正全面、客观、正确地分析20世纪初中国独特的历史环境、现实条件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内在组织性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产生的独特的历史使命感,自然也就无法科学揭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最初目的和原始想法、历史职责与现实任务即初心与使命究竟是什么。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去分析和解读20世纪初中国独特的历史环境、现实条件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组织内在性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产生的独特的组织使命感,才能科学揭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真正初心与使命及其表现形式。

一、民族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第一社会政治前提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第一政治前提是现代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因为,只有建立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才能把分散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高效使用并有力地启动和推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进程。^[3]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9世纪后期,英法德日意俄美等国都顺利实现了统一强大民族国家的建构,为它们的现代化启动和推进提供了第一政治前提。

自秦王朝统一中国后,除少数历史时段处于分裂状态外,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中国都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虽然那时它还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统一的大国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世纪后期之前,中国GDP总量长期占据世界第一位,本来这会成为中国提前步入现代化的优势。中国早在15世纪中叶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国家和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初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采取了放任与支持的 policy,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转

型。但是,自“康乾盛世”(1681—1796)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加上农民起义频发,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中央政府只得依靠地主武装和地方势力,地方力量崛起并渐成分裂割据之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无法再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强力启动和推进,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起启动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部分任务。可是,缺乏中央政府的有力推动,国家层面的现代化进程缓慢。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后,各地军阀相互混战、轮流控制中央政府,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军阀割据与军阀政治,这是一种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军阀依靠的是少数地主、资本家及其控制的军队,代表占社会少数的这两个阶级的利益,它们不可能代表社会中占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也无法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关注自己和地方的利益。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深受西方帝国列强的殖民统治之害,帝国主义在中国拥有法外治权,它们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抢夺中国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在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要推进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建立起团结统一强大的以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共生共长的民族国家,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也即孙中山先生说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民主革命。

那么,谁来领导并建立团结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20世纪初最多时中国曾有300多个政党和政党式政治组织,主要分为革命和改良两大对立的党派,都在探索统一中国、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之路。^[4]那时,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要数中国国民党,可是,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依靠并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政党组织,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曾经提出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但在蒋介石控制中国国民党以后抛弃了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政治主张,实行了反共反农工

的思想和政策,这是由其阶级性质决定的,中国国民党不可能得到中国大多数人民大众即工农的衷心拥护和长期支持,无力完成建立真正团结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中国要建立真正团结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既无法指望中国各地分裂割据的封建军阀,也没有办法依靠中国国民党等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去实现。其他社会力量,包括各种代表贵族地主阶级的君主立宪派政党,既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敌视工农阶级的一些“中间势力”政党,更是没有想法,也无资格与能力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只有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和革命主体、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标、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有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整体利益、建立团结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想法、资格和能力。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就先后与中国国民党两次合作发起了打倒军阀的北伐战争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又主张建立联合政府统一中国,可惜,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破坏了国家的统一进程。

通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终于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真正强大的民族国家。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讨论《共同纲领》时讲到中国应该实行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国家结构问题时说:“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5]后来,毛泽东主席还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6]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7]可见,建立团结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力推进奠定了第一社会政治前提,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最重要的初心与使命。

二、民主共和建构:建立民主廉洁 高效的“共和政府”

“共和政府”是相对于“君主政府”的一种政体形式。“君主政府”是由特定家族成员继承君主职位,君主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并组织政府,政府的方针、政策优先考虑君主及其家族、个别民族(如元朝的蒙古族)或几个民族(清朝的满族、蒙古族)的局部利益和意志的政体。中国自秦以后均实行高度专制的“绝对君主制政体”,除少数历史时期出现过相对较为开明、清廉、高效的政府外,绝大部分时间里,皇帝制度下的旧中国政府均专制独裁、腐败低效。而“共和政府”是由百姓或百姓的代表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并组织政府,政府方针、政策优先考虑百姓或曰人民的权利与利益、国家与各民族的整体利益,而非个人、家族或一个或几个民族、少数地方利益的政体形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究竟选择“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理论上的争论和实践上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异常激烈,摧毁专制腐败低效的旧政府,建构民主廉洁高效的新政府是时代的呼唤。遗憾的是,在推翻专制腐败低效的满清政府之后,历届军阀政府同样是专制腐败低效的政府,即使是后来取代军阀政府的国民政府同样被“四大家族”和西方帝国主义所控制,根本不顾各族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因此,是“假共和、真专制”。推翻专制腐败低效的旧政府,建构民主廉洁高效的新政府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没有自己特殊的政党利益和阶级利益,把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中国共产党身上,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二个初心与使命。后来,无论是江西中央苏区,还是延安等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建构的都是民主廉洁高效的政府:豆选制人民代表和官员、“三三制”的政府领导结构、政府人员少且低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等。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关于“人亡政息”的周期律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类似观点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提出“多党合作”思想)和《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国体思想)中也不断提到,建国后的历史也证明中国共产党实践了这一初心与使命,从中央到地方的首届人民政府领导层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了30%左右,还大量吸纳少数民族人员出任各级政府官员。在基本肃清国内外反革命残余,完成抗美援朝的历史任务后,1954年由人民选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各级人民政府的民主共和政体设想终于在中国成为现实。

三、人民中心确立:推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革命与执政理念

无论是满清政府时期,还是民国政府时期,由于分裂、战乱,加上执政者为特权阶级、资本集团服务的革命与执政理念,有限的社会资源得不到公正合理高效的使用和分配,旧中国始终无法走出贫穷落后的状态。满清政府是旧式王朝政治,以爱新觉罗家族、满蒙少数民族的利益和特权为中心,从法律到制度、政策,包括政治地位、经济(财政、税收、土地、矿产、金融、贸易等)特权、文化教育特权等方面,都向爱新觉罗家族、满蒙少数民族倾斜,汉族和其他民族受到歧视,只要损害特权阶级和阶层的局部利益的人和组织都是他们打击的对象。多数民族中只有与满清政府合作的少数汉族地主、资本家及其家族的利益和特权才会得到政府的保护。

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要让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把工农大众的利益

放到第一位或中心去考虑。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的军阀统治同样实行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等特定阶级利益和特权阶层服务的执政理念。具体来说,军阀政府维护的是军阀家族、军阀所在省区地方、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和特权,百姓的利益、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根本没人考虑。即使后来孙中山先生曾有《建国大纲》描绘未来中国的民族和国家发展大计,可惜因其早逝终未能实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更是背叛了孙先生的遗愿,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利益和特权的代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国库几乎被这四大家族掏空,国民党内贪腐盛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可见,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领导中国人民推翻这“三座大山”,让国家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一旦共产党执政,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实行“执政为民”的理念就是自然的选择,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三个初心与使命。所以,从第一个党纲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指出要“实行社会革命”,“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推行民主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劳动者组织起来,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9]中国共产党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从根据地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从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如今的“走共同富裕之路”,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都是这一初心与使命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10]从毛泽东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民中心”这一建党初心与使命的一脉相承的最好表述。

四、主权独立实现:赢得自主平等的 “主权国家”地位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门户洞开、内忧外患,逐步沦落为依赖依靠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国家。《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瑛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把中国大量的国土割让或“租借”给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由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银行、保险、铁路、矿山、港口、码头等经济、金融、交通命脉由帝国主义操纵,西方的工业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挤压而奄奄一息,帝国主义的军舰在中国沿海和内河横冲直撞。1895年在日本马关,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竟然要求中国代表李鸿章一字不改接受日方提出的所有屈辱条件。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昏庸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帝国主义出卖德国原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给日本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引发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堂堂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受尽欺凌。^[11]

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让中华文明的光芒重新绽放在人类文明的灯塔上,让中华民族重新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尊重,真正自主平等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20世纪初中国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四个初心与使命。当时的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其性质决定了它们必然依赖依靠依附于帝国主义才能巩固它们的统治地位。只有依靠工农大众的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真正为中国赢得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早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思想和政治准备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先进代表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起,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依赖依靠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做法,坚决主张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地统治,强烈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竭力主张

建立主权完全独立的新中国。还在长征路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就宣布要北上抗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政府宣布废除旧中国历届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同时,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2]即使在需要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仍然在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方面毫不含糊、决不妥协,以至于后来得罪苏联,被取消所有援助也在所不惜。对西方国家,一方面,对敌视新中国的美欧力量采取无所畏惧、迎头痛击的战略,如,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越等。另一方面,对愿意与新中国和平相处、平等相待的欧美国家,中国政府与之积极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新中国在自己刚刚摆脱战争创伤,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反霸,积极开展国际援助,体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中国综合国力大大提升的情况下,与别的国家实行独立自主、互不干涉、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真诚相待、平等合作的方针。可见,“主权独立”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四个初心与使命,且至今初心不改。

五、中国道路探索:探求通向共产主义的中国之路

各国共产党都曾明确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终目标。可是,不同国情的国家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一样的吗?建党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在思考、探索这个问题,并且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19 纪末、20 世纪初,各种主义充斥中国,人们在混乱的思想形态中寻找中国未来的出路,很多主义在中国也试验过、实践过,但都没有成功。正在中国人民彷徨迷茫的时候,“十月革命”一

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的成功是一个工业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实现社会革命并走向社会主义的成功案例。马克思主义在苏俄的成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于是,了解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敬苏俄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当时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与以工业、城市和工人为主体的俄国国情不同,中国无法依靠弱小的城市工人阶级赢得革命胜利并进入社会主义,必须首先要依靠广大农民和工人阶级,建立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然后,才能谈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的第一个党纲中就明确指出,在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后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团结和联合的对象之一,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的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最后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13]可见,从建党起,中国共产党就明白,中国走向共产主义要分三步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1923 年李大钊在北大的课堂上讲到中国革命道路时明确说:“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4]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发现,中国的民主主义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前者是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是参加者但不是领导者,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和政策。后者是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寻找不同于苏俄实现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独特的中国道路和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独特探索与卓越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五个初心与使命。虽然后来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上曾经有过盲从

共产国际和苏联模式的深刻教训,但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特色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哪怕这种探索充满曲折和坎坷,付出巨大代价,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初心不改、一往无前。

总之,中国共产党用28年时间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又用70多年时间发展了新中国,履行了其“民族国家建设、民主共和构建、人民中心确立、主权独立实现、中国道路探索”的建党初心与使命,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如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古老的东方文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夺目光彩。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可以无比骄傲地告慰革命前辈和先烈,您的初心与使命已经基本实现了!明白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与使命的上述具体形式及其深刻原因,我们就可以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在各项改革中积极主动践行这些初心与使命,用这些初心与使命去衡量我们的理念、法律、制度、政策和行为,对照我们的国家建设、社会建设、思想建设和党的建设,就可以明白我们哪些方面做得很

好,哪些方面还需努力。这对于我们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注释:

[1][7][1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4、12页。

[2][4]朱汉国:《中国政党制度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3、36页。

[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10、138页。

[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

[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

[8]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48、149页。

[9][13]《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58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4]李大钊为北京大学政治、经济两系开设的课程《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1923年),见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资料。

[责任编辑:汪家耀]